

# 从选举制审视唐人的及第登科入仕

王勋成

内容提要 按唐选举制，张九龄长安二年进士及第，神龙三年制举材堪经邦登科，解褐秘书省校书郎，又于先天元年九月应制举道侔伊吕科，登科后授官左拾遗。刘禹锡与柳宗元于贞元九年同榜进士及第，刘禹锡贞元十一年冬就博学宏词登科，授官太子校书；而柳宗元却于贞元十四年春始登博学宏词科，释褐集贤书院正字。

关键词 张九龄 刘禹锡 柳宗元 及第 登科 入仕

按唐选举制，进士及第后，必须守选三年，三年期满，方可赴吏部参加冬集铨选，注拟授官。若想提前入仕，可参加制举试或吏部科目选试，登科后立即授官<sup>①</sup>。但许多有关唐人的传记、年谱等，却认为进士及第之时，就是其释褐入仕之年，尤其以为初盛唐不存在守选，对制举试和科目选试也有着这样那样的误解。现在，我们就以张九龄、刘禹锡、柳宗元三人为例，通过对他们及第登科入仕的考订，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 一 张九龄及第登科入仕考

张九龄，两《唐书》有传，其早年仕履，《旧唐书》本传云：

登进士第，应举登乙第，拜校书郎。玄宗在东宫，举天下文藻之士，亲加策问，九龄对策高第，迁右拾遗。

《新唐书》本传云：

擢进士，始调校书郎，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为左拾遗。

二书所记略有不同，且都未载其进士及第、制举登科之年月。

《全唐文》卷四四〇收有徐浩《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以下简称《神道碑》），所记较为详细：

公讳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其先范阳方城人。……弱冠，乡贡进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扬，一举高第。时有下等，谤议上闻，中书令李公当代词宗，诏令重试，再拔其萃，擢秘书省校书郎。应道侔伊吕科，对策第二等，迁左拾遗。

清徐松《登科记考》根据两《唐书》本传及徐浩《神道碑》，将张九龄进士及第系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下，又分别于中宗神龙三年（707）制举材堪经邦科下和睿宗景云三年（712）制举道侔伊吕科下系有张九龄之名。现在，我们就用唐代选举制对这三次及第登科一一加以考辨。

徐浩《神道碑》云：“弱冠，乡贡进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扬，一举高第。”“考功郎”为考功郎中与考功员外郎之合称，既可单称考功郎中，亦可单称考功员外郎。自贞观初至开元二十四年（736）皆由考功员外郎知贡举，故知此“考功郎”乃考功员外郎之称。沈佺期为考功员外郎在武后长安二年<sup>②</sup>，故《登

① 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第二章，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1—55页。

② 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一“沈佺期”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8页。

科记考》将张九龄进士及第系于长安二年下，并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一段话说：“张九龄，曲江人，长安二年进士。”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根据以上资料在长安二年下系云：

二月，考功员外郎沈佺期知贡举，试《东堂壁画赋》，张九龄、徐秀等二十一人登进士第；复令李峤重试，九龄再拔其萃，授秘书省校书郎。张九龄本年年二十。<sup>①</sup>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就认为张九龄进士及第后即授官秘书省校书郎。并云：“张九龄本年年二十。”按，“张九龄本年年二十”有误。关于张九龄享年有两种说法，一是两《唐书》所谓“病卒，年六十八”，一是《神道碑》所载：“开元二十八年春，请拜扫南归，五月七日遘疾，薨于韶州曲江之私第，享年六十三。”大多数学者都采用《神道碑》的说法，订其享年为六十三岁。但《神道碑》撰写于代宗大历年间。宋赵明诚《金石录》卷八收有《唐张九龄碑》，并注曰：“徐浩撰并正书，大历中书、撰，长庆中刻石。”又在卷二八《跋尾十八》中说：

右《唐张九龄碑》，徐浩撰并书，欧阳公《集古录》云：“案《唐书·列传》所载，大节多同，而时有小异。碑，长庆中立，而公薨在开元二十八年，至长庆三年，实八十四年。所传或有异同，至于年寿、官爵，子孙宜不谬，当以《碑》为是。”今考之，徐浩撰《碑》时为岭南节度使，在大历间，距曲江之卒未远，至长庆中，其家始刻石尔。

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第十五编《岭南道·广州》载徐浩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观察使在大历二年至三年（767—768），可信。又引《宝刻丛编》卷一九云：“《集古录目·唐中书令张曲江碑》称唐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徐浩撰并书。”故知徐浩所撰碑文当在大历二、三年，距张九龄之卒有二十八年，至长庆三年（823）立碑时又过了五十五六年，所以有的学者就对徐浩所撰碑文称其享年六十三产生了怀疑，仍采用两《唐书》的说法，订其卒年为六十八岁。如李世亮先生的《张九龄年谱》就执此说<sup>②</sup>。我认为享年六十三是正确的。周绍良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收有《唐故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始兴公阴堂志铭并序》云：

公之生岁六十有三，以开元廿八年五月七日薨，廿九年三月三日迁窆于此。

题下署名为“太中大夫守中书侍郎集贤院学士东海县开国男徐安贞撰”。张九龄曾封始兴县伯，故序称其为“始兴公”。阴堂志铭撰刻于开元二十九年（741）三月，距张九龄之卒不到一年；徐安贞又与张九龄同朝为官，故所记当信。则张九龄享年六十三应无疑义。由开元二十八年（740）上推，张九龄生年为高宗仪凤三年（678），长安二年进士及第时为二十五岁，《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谓“张九龄本年年二十”就有误。《神道碑》云其“弱冠，乡贡进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扬，一举高第”，是说张九龄弱冠二十岁时，即武后神功元年（697），便参加了当地州府的进士考试，合格后被州府贡举为“乡贡进士”，而非“一举高第”时为弱冠二十岁。可见张九龄参加了几次省试才进士及第的，《神道碑》说他“一举高第”即考试一次就及第乃誉词。

张九龄进士及第后是否即授官秘书省校书郎了呢？

《新唐书》云：“擢进士，始调校书郎。”语焉不详。《神道碑》则云：“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扬，一举高第。时有下等，谤议上闻，中书令李公当代词宗，诏令重试，再拔其萃，擢秘书省校书郎。”似张九龄进士及第后即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就依此而考订张九龄及第入仕在同一年。然遍查有关文献，并无长安二年进士重试的记载。又，“中书令李公”乃李峤，查《新唐书·宰相表上》，长安二年李峤并未担任中书令，李峤拜中书令在中宗神龙三年也就是睿宗景云元年的七月。另外，唐代进士及第，只有两个等第，即甲第与乙第，世称甲乙科。但有唐一代，只设一个等第，即乙第，甲第是从来不授人的。然人们习惯上则称进士及第为甲科、高第，是誉称。徐浩《神道碑》谓“时有下等”

① 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页。

② 李世亮《张九龄年谱》，《韶关师专学报》1981年第1期。

云云，可唐人对进士试未及第者多称“下第”、“落第”，而不称“下等”，称“等”者，只有制举试和铨选试。《新唐书·选举志下》就说：“凡试判、登科谓之‘入等’。”“试判”是指铨选试，因铨试以试判为主；“登科”是指制举试和科目选试。

按唐制，进士及第后，不能立即授官，得守选三年；三年期满，方可赴吏部参加冬集铨选，释褐授官。若想提前入仕，可在守选期间参加制举试<sup>①</sup>，登科后即可授官。

那么，张九龄是何时授秘书省校书郎的呢？又因何而授官的呢？

据《旧唐书》载：“登进士第，应举登乙第，拜校书郎。”“应举”者，当应制举也，故知张九龄进士及第后是应制举试登科授官的，而非守选期满经冬集铨选而授官的。按唐制，张九龄长安二年进士及第，守选三年，于中宗神龙元年（705）就守选期满，是年十月即可参加冬集，神龙二年（706）春就可经铨选注拟而授官。但他却宁肯推迟一年而要参加制举试，因制举不但是天子“待非常之才”的一种取士制<sup>②</sup>，登科后可授美官，而且为以后的仕进填铺了捷径。张九龄所应制举为材堪经邦科。《册府元龟》卷六四五《贡举部·科目》载有中宗神龙年间的制举科目，云：“三年，材堪经邦科，张九龄、康元瓌及第。”《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制科举》亦有是载，云：

神龙二年，才膺管乐科，张大求、魏启心……赵不为及第。……

二年，才堪经邦科，张九龄、康元瓌及第。

显然，后一个“二年”当为“三年”笔误。前已论证，李峤为中书令是在神龙三年七月。由此可知，“时有下等，谤议上闻，中书令李公当代词宗，诏令重试”，是指神龙三年的制举试，而非长安二年的进士试。徐浩是唐代人，又明经及第，对科举制度是熟悉的，且碑文又是根据张九龄子孙所提供的行状而撰写的，不可能将制举重试说成是进士重试。故“一举高第”与“时有下等”之间必有脱误，其误非徐浩撰写所致，而是长庆三年刻石时或后人传抄时所脱。重试的结果是张九龄“再拔其萃，擢秘书省校书郎”。

总括以上，知张九龄释褐授官秘书省校书郎是制举登科的结果，而非进士及第所授。时间是中宗神龙三年，而非武后长安二年。《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不察，以为是长安二年进士重试所授，误。

《登科记考》将张九龄第二次应制举道侔伊吕科系于睿宗景云三年下，并引《旧唐书·张九龄传》云：“玄宗在东宫，举天下文藻之士，亲加策问，九龄对策高第。”按，李隆基为太子是在睿宗景云元年（710）六月，至景云三年八月登皇帝位，并改元先天元年。《登科记考》卷五根据洪迈《容斋续笔》引《登科记》的记载，以为这一年的制举试在九月，可信。并云：“按是时玄宗虽即位，仍未听政，故犹称春宫，张九龄对策亦称殿下也。”可见，这年的制举试应在玄宗先天元年九月。《册府元龟·贡举部·科目》就将张九龄应制举道侔伊吕科系于玄宗先天元年下，云：

玄宗先天元年十二月，制令京文武官及朝集使五品以上，各举堪充将帅者一人。又有文经邦国科，韩休及第。藻思清华科，赵冬曦及第。……道侔伊吕科，张九龄及第。

《唐会要·贡举中·制科举》亦云：

先天二年，文经邦国科，韩休及第。藻思清华科，赵冬曦及第。……道侔伊吕科，张九龄及第。按，“先天二年”当为“先天元年”之笔误。刘禹锡《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处厚）集序》亦云：

皇唐文物与汉同风，故天后朝燕国张公说以词标文苑征；玄宗朝曲江张公九龄以道侔伊吕征。<sup>③</sup>

由此可见张九龄应制举道侔伊吕科是在玄宗登极后的先天元年。

徐浩《神道碑》云：“应道侔伊吕科，对策第二等，迁左拾遗。”在唐代开元以前，制举试从未有第一等的，也就是说第一等是从来不受人的，最高等第是第二等。第二等也称为乙等、乙第、乙科。

① 开元十八年前，只能参加制举试；开元十八年后，吏部又设立了科目选试。见《唐代铨选与文学》第八章，第272—279页。

② 《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制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59页。

③ 《全唐文》卷六〇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109页。

如刘肃《大唐新语》卷八《文学》载：

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阳城南门亲自策问，张说对策为天下第一。则天以近古以来未有甲科，乃屈为第二等。

“应制者”，即应制举者也。《旧唐书·张说传》亦云：“弱冠应诏举，对策乙第。”《新唐书·张说传》亦谓：“永昌中，武后策贤良方正，诏吏部尚书李景谌糊名较覆，说所对第一，后署乙等。”这里所说“则天以近古以来未有甲科”，是指第一等。两《唐书》谓张说“对策乙第”、“后署乙等”，是指“乃屈为第二等”。可见开元以前制举试最高等第为第二等，开元以后第二等也不再授人了，最高等第为第三等。

张九龄应制举道侔伊吕科对策第二等后，即超授拾遗官。《旧唐书》谓：“九龄对策高第，迁右拾遗。”《新唐书》则云：“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为左拾遗。”那么张九龄到底授官是左拾遗还是右拾遗呢？左、右拾遗虽品阶一样，皆为从八品上之供奉官，但左拾遗属门下省，右拾遗属中书省。

徐浩《神道碑》以为：“应道侔伊吕科，对策第二等，迁左拾遗。”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〇在开元元年（713）十月下系云：

左拾遗曲江张九龄，以元之有重望，为上所信任，奏记劝其远谄躁，进纯厚。

《全唐文》卷二九〇收有张九龄的《上姚令公书》，就是劝姚崇（字元之）“远谄躁，进纯厚”的，书云：“月日，左拾遗张九龄谨奏记紫微令梁公阁下。”称自己为左拾遗。另外，《全唐文》卷二八八还收有张九龄的《上封事书》，亦云：

五月二十日，宣义郎、左拾遗内供奉臣张九龄谨再拜死罪死罪，上书开元神武皇帝陛下。

杜佑《通典》卷一七《选举五·杂议论中》曾引有“开元三年，左拾遗张九龄上书曰”一文，所引之文就是张九龄的《上封事书》，知张九龄的《上封事书》写于开元三年（715）五月二十日。则开元三年时，张九龄的官职仍为左拾遗。

由以上数例可证，张九龄应道侔伊吕登科是在玄宗先天元年九月，其所授官为左拾遗内供奉，而非右拾遗，《旧唐书》误。

## 二 刘禹锡登科入仕考

刘禹锡，两《唐书》有传。关于其及第登科，《旧唐书》云：“禹锡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又登宏辞科。”《新唐书》云：“擢进士第，登博学宏辞科，工文章。”刘禹锡擢进士第在贞元九年，除《旧唐书》外，《唐才子传》亦云：“贞元九年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工文章。”《登科记考》更详细地记载了贞元九年三十二名及第进士中的二十三人姓名，其中就有刘禹锡。

两《唐书》本传皆谓刘禹锡进士及第后，又登博学宏辞科，但都未言其登科年月。刘禹锡在其《子刘子自传》中则云：“禹锡既冠，举进士，一幸而中试。间岁，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sup>①</sup>只是说“登吏部取士科”，并未言登博学宏辞科，则“取士科”属吏部什么科目？它与博学宏辞科有无关系？

我们说，进士及第后，守选三年，三年期满，就可赴吏部参加冬集，经铨试后方可注拟授官。这就是常调、平选。常调、平选属吏部正常的铨选。不是什么“取士科”，而且必须是三年，与“间岁”不符。

若守选未满，而想提前入仕，可参加制举或吏部科目选试，登科后即可授官。吏部科目选一年一次。《册府元龟》卷六三九《贡举部·总序》载：

又有吏部科目，曰宏词、拔萃、平判，官皆吏部主之。又有三礼、三传、三史、五经、九经、

<sup>①</sup> 《全唐文》卷六一〇，第6166页。



开元礼等科，有官阶、出身者吏部主之，白身者礼部主之。

吏部科目选，主要有博学宏词科、书判拔萃科和平判科，这是吏部于开元年间自设的科目；其他如三礼、三传、三史、五经、九经、开元礼、学究一经等科，都是吏部于中晚唐期间仿照礼部贡举试而设的。

吏部除平选与科目选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科目。由此可知，《子刘子自传》所说“闻岁，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就是以文登吏部科目选，具体而言，即两《唐书》所说的登博学宏词科。

卞孝萱先生的《刘禹锡年谱》是目前有关刘禹锡生平的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该书在贞元九年下系曰：“二十二岁。登进士第，又登宏辞科。”<sup>①</sup>将刘禹锡进士及第与宏辞登科系于同一年。许多研究刘禹锡诗文及评传的著作都采用了这一说法。

我们说，进士及第后就参加当年春天的博学宏辞科考试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博学宏辞试与进士试在时间上相差不了几天，甚至多在进士试之前举行，因进士试人多，且考试手续较宏辞试复杂得多，故往往考试迟。另外，更重要的是，进士及第后，要参加宏辞科考试，必须先到州府取得宏辞解，这与礼部举试需要文解、吏部铨试需要选解一样。如王昌龄写有《送刘沄虚归取宏词解》诗<sup>②</sup>，是送刘沄虚进士及第后归江东原籍去取宏词解的。韩愈也有《答崔立之书》云：“闻吏部有以博学宏词选者……因又诣州府求举。”<sup>③</sup>“求举”就是取解。取解时，州府还要进行考试。如欧阳詹写有《怀州应宏词试片言折狱论》<sup>④</sup>，是欧阳詹进士及第后在怀州取宏词解时，参加该州宏词科试之论题《片言折狱论》而写的。取宏词解及参加州府考试又都在秋季，这又与州府乡贡试及举子、选人取解是一致的。由此可知，进士及第后，要参加科目选，得先于当年秋季取得州府解，然后才能赴吏部冬集而试，故及第当年春天就参加宏词试是万万不可能的。

那么，刘禹锡是否参加了当年冬天的博学宏词科考试呢？

吏部铨选，包括科目选，都始于每年的孟冬十月至第二年的季春三月。由于参加吏部科目选考试的人少，而审核手续又比较简单，故这一届的科目选试就有可能在上一年度的冬十二月举行，这一点与礼部贡举试、吏部铨选试不一样。贡举试、铨选试必须在第二年春举行。这与人多、手续繁杂有关。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刘禹锡是否于贞元九年冬登博学宏词科的。

韩愈《上宰相书》云：“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sup>⑤</sup>韩愈于贞元八年（792）进士及第，又参加了贞元九年（793）、十年（794）、十一年（795）这三届的博学宏词科试，但都未登科，故曰“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现在让我们通过韩愈来看一下这三年的博学宏词科考试时间。

与韩愈同年进士及第的李观也参加了贞元九年的博学宏词科试并登科，授予太子校书。第二年即贞元十年，他病逝于长安。韩愈写有《李元宾墓铭》，云：

李观字元宾，其先陇西人也。始来自江之东。年二十四举进士，三年登上第。又举博学宏词，得太子校书。又一年，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师。<sup>⑥</sup>

知李观贞元五年（789），二十四岁时被州府举荐为进士，三年后即贞元八年进士及第，年二十七。贞元九年登宏词科，授太子校书，年二十八。过了一年即贞元十年夏，病死于长安，年二十九。

然《唐诗纪事》和《登科记考》却将李观与陆复礼、裴度宏词登科系于贞元八年下，而朱熹《韩文考异》却认为此三人所试在贞元九年，当是正确的。若是贞元八年登科，李观就不是“又一年，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师”了。

① 卞孝萱《刘禹锡年谱》，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4页。

② 《全唐诗》卷一四〇，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26页。

③ 《全唐文》卷五五二，第5586页。

④ 《全唐文》卷五九八，第6041页。

⑤ 《全唐文》卷五五一，第5582页。

⑥ 《全唐文》卷五六六，第5730页。

再从是年所试诗看，这年宏词科诗为《中和节诏赐公卿尺诗》。按，贞元五年，德宗下诏，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取代正月三十晦日节。并以这一天赐尺于各公卿，取其平和之意，从此相沿成习，是为宏词科试题《中和节诏赐公卿尺诗》之所本。由诗题及李、陆、裴三人所试诗内容看，皆写仲春初之景事，则知是年宏词试当在贞元九年二月上旬举行。是年赋为《钧天乐赋》，朱熹《韩文考异》认为韩愈《颜子不贰过论》当为这年宏词试论题，是正确的。然韩愈这年却未登科。

那么，贞元十年这一届的博学宏词科试是否是在贞元九年冬举行的呢？也不是。韩愈参加了这一届的博学宏词科试。贞元九年六月，他到凤翔，上书凤翔府尹邢君牙，除想得到经济上的援助外，更重要的是要取得宏词解。解取到后便参加了贞元十年春这一届的科目选。考试前写有《应科目时与人书》，题一作《与韦舍人》<sup>①</sup>，知此书乃韩愈应试前上与博学宏词试考官韦舍人的。由书中内容看，与春景有关，当写于贞元十年初春。

这一次，韩愈被吏部取中，却又被中书省驳下。按唐制，应科目选者，吏部取中后，还得上呈中书省复审。韩愈在《答崔立之书》中说：“闻吏部有以博学宏词选者，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术。……凡二试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书。”<sup>②</sup>一般来说，登博学宏词科者不超过三人。韩愈被中书省驳下后，这一届的登科者只有二人，即张复元、李绛，而《登科记考》将张、李二人系于贞元九年下是错误的。这年博学宏词科的试题赋为《太清宫观紫极舞赋》，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又补充了这年宏词科的试题诗为《恩赐耆老布帛诗》，是对的，但仍系于贞元九年下却是错误的。论之试题已佚。

既然刘禹锡不可能参加贞元九年春的博学宏词科试，而贞元九年冬又未举行博学宏词科试，那么说刘禹锡贞元九年进士及第后，当年又登博学宏词科，就大错而特错了。又，凡进士及第后，再登博学宏词科者，必须立即授官，但刘禹锡于贞元九年并未授官，而是“间岁”后始授官，可见，刘禹锡不是贞元九年登博学宏词科的。

《子刘子自传》云：“举进士，一幸而中试。间岁，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这就是说，刘禹锡于贞元九年进士及第后，隔了一年，即贞元十一年，“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既然是“以文登吏部取士科”，则此“取士科”必然要以文著称，也就是说要考文。在吏部的各类科目中，只有博学宏词科是以文著称的，因此科考的是诗、赋、论三篇。《刘禹锡年谱》以为此取士科是拔萃科，则否，因拔萃科考的是判三条，而判以叙事说理为主。由此可知，贞元十一年，刘禹锡是以博学宏词登科的。

然而，贞元十一年这一届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不在是年春，而是在贞元十年冬。这一届的博学宏词科试题是《朱丝绳赋》、《冬日可爱诗》和《学生代斋郎议》。登科者为陈讽、王太真、庾承宣三人，俱见《登科记考》卷一三。

从陈讽、庾承宣所试《冬日可爱诗》来看，皆写当时的冬日景象，诗当作于冬天。如陈诗云：“寒日临清昼，寥天一望时。未销埋径雪，先暖读书帷。”<sup>③</sup>庾诗云：“宿雾开天霁，寒郊见初日。林疏照逾远，冰轻影微出。岂假阳和气，暂忘玄冬律。”<sup>④</sup>“玄冬”，即冬季，见《辞源》注。王太真诗已佚。由二诗知，考试是在贞元十年冬举行的。

又，宋代乐史《广卓异记》卷一九“进士状元却为宏词头”条载：“右按《登科记》，陈讽，贞元十年进士状元及第，当年宏词头登科。”按唐制，进士及第者在当年春天是不能也无法参加博学宏词科试的。而陈讽既然是在进士及第的当年就以宏词头即第一名登科，则他登科必在是年冬无疑，由是亦可证贞元十一年这一届的博学宏词科考试是在贞元十年冬。

韩愈也参加了这一届的考试，但又第三次落选了，于是他便向宰相上书求荐，写有《上宰相书》，

① 《全唐文》卷五五三，第5599页。

② 《全唐文》卷五五二，第5586页。

③④ 《登科记考》卷一三，第497页。

时间为贞元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由此亦可证这年的博学宏词试在贞元十年冬而非十一年初春,因考试、阅卷、录取、报呈中书省复审到放榜,再到韩愈向宰相写书、上呈等,最少也得一月有余。

刘禹锡并未参加这一届的博学宏词科试,或者说即使参加了也未登科。《子刘子自传》载:“间岁,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从贞元九年春进士及第到贞元十年冬宏词登科,就不是“间岁”了。再按唐制,每届宏词科最多录取三人,这一届的宏词登科者为陈、王、庾三人,则刘禹锡当不会再“以文登吏部取士科”了。

贞元十一年这一届的博学宏词试是在贞元十年冬举行的,那么,贞元十一年春当不会再举行宏词试了,则刘禹锡“间岁,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又作何解释呢?

刘禹锡参加的“取士科”即博学宏词科是指贞元十二年(796)这一届的考试,而这一届的考试也恰在贞元十一年冬举行。

欧阳詹是贞元八年与韩愈同榜进士及第的,并与韩愈一同应贞元九年春博学宏词科试不第,便南下归故乡泉州省亲,至十年夏始北上,准备到长安参加是年的制举直言极谏科试,但却未来得及。十一年十月在洛阳写有《与张尚书书》,是写给徐州刺史、徐泗濠节度观察使、检校礼部尚书张建封的。书云:“去秋远应直言极谏诏,不逮试便往西秦。今冬将从博学宏词科,赴集期。”<sup>①</sup>按,“去秋”云云,是指贞元十年十月所举行的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考试,因制举诏令限应试者必须在七月内到京,故曰“去秋”。由“今冬将从博学宏词科”知,贞元十二年这一届的博学宏词科试是在贞元十一年冬举行。“将从”,乃将参加之意。刘禹锡就是参加这一届的宏词试登科的,而欧阳詹也参加了却未能中式。

《刘禹锡年谱》谓刘禹锡贞元九年“登进士第,又登宏辞科。识李绹”,并云:

兹定禹锡于本年登宏辞科者,理由有三:

(一)禹锡《祭兴元李司空文》云:“追怀周旋,弥四十年。射策校文,接武联翩。”“李司空”即李绹,于贞元九年登宏辞科(参阅《登科记考》卷一三),“授秘书省校书郎”(据禹锡《唐故相国李公集序》[以下省称《李序》])。祭文中所谓“射策”,指登宏辞科;所谓“校文”,指授校书郎。再看《自传》:“……举进士,一幸而中试,间岁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禹锡“校文”(贞元十一年)在李绹之后,故云“接武”;然则所谓“联翩”者,当指“射策”而言。此为刘、李于贞元九年同登宏辞科之证。

(二)《李序》云:“始愚与公为布衣游。”可见刘、李订交,在李绹为校书郎之前,否则不能称为“布衣游”。其订交之媒介,既非“校文”,当系“射策”。此为刘、李同登宏辞科之旁证。

(三)从唐代科举制度来看,禹锡于本年联登进士、宏辞两科,是可能的。张复元就是一例(参阅《登科记考》卷一三)。

对以上三个理由,让我们逐条作一辨析。

(一)刘禹锡在《祭兴元李司空文》中所谓“射策”,并非指登宏辞科,而是指进士及第,因宏辞科不考策,而是考诗、赋、论三篇。进士科最早只考时务策五道,后来才加试帖经与杂文诗赋的,故试策始终为进士科之强项。则“接武”当指“射策”。李绹贞元八年进士及第,刘禹锡贞元九年进士及第,故曰“接武”。所谓“校文”,指李绹授秘书省校书郎、刘禹锡授太子崇文馆校书(简称太子校书)。前已论及,李绹登宏辞科在贞元十年春,而非贞元九年,《登科记考》误,则授秘书省校书郎亦当在贞元十年春。刘禹锡登宏辞科在贞元十一年冬,而授太子校书则在贞元十二年春,因吏部注拟授官多在春天,所谓“联翩”者,当指“校文”。细玩祭文文义,“射策校文,接武联翩”,作互文见义解似更恰当,即“射策”不仅“接武”,而且“联翩”;“校文”不仅“联翩”,而且“接武”。若刘、李于贞元九年同登宏辞科,则既非“接武”,亦非“联翩”。据《辞源》释:“接武,行路足迹前后相接。”“联翩,鸟飞貌,形

<sup>①</sup> 《全唐文》卷五九六,第6023页。



容连续不断，前后相接。”刘、李同登宏辞科，就不是“前后相接”，而是同时。

（二）《李序》云：“始愚与公布衣游。”则刘、李订交，当在“李绛为校书郎之前”不假。具体说，在贞元九年春，时李为前进士，刘为新及第进士，故有可能互相拜访，且有一年的时间足以交游。若二人于贞元九年同登宏辞科，则李已授官，当无“布衣游”时间。

（三）从唐代选举制度看，一个人于本年联登进士、宏辞两科者，除非是将下一年春天举行的宏辞科试，提前到上一年即本年冬十二月举行，否则是不可能的。前已论证，贞元九年冬并未举行宏辞科考试。张复元贞元九年春进士及第，贞元十年春宏辞登科，并非“本年联登进士、宏辞两科”。《登科记考》将张复元宏辞登科系于贞元九年下，乃误。《刘禹锡年谱》不察，以讹传讹，当然也就不足为证了。

《刘禹锡年谱》于贞元九年下又系有两条资料来证明刘是本年登宏辞科的。一条云：

《通典·选举·历代制》下云：“其制诏举人，不有常科，皆标其目而搜扬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本年刘、李同登宏辞科，李绛“陞甲科”（《李序》），故得为校书郎。禹锡未获官职，当系次等。

按，《通典》所言，指的是制举考试，宏辞科非制举科目。吏部科目选，包括宏辞、拔萃等，只限于已取得出身而尚未入仕者和六品以下罢职的前资官才能参加，且每科最多取三人，宁缺毋滥，并无“文策高”与“其次”之分。而制举考试，就有限制，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只要文策高，白身人、出身人、前资官，都可以授以美官。若考为次等者，即最末一等第五等上，则有出身与前资官者，仍授以官，而只有白身人才“与出身”，即所谓的制举出身，与进士出身同，也守选三年<sup>①</sup>。

另一条资料云：

禹锡有《贞元中侍郎舅氏牧华州时余再忝科第前后由华觐谒陪登伏毒寺屡焉亦曾赋诗题于梁栋今典冯翊暇日登楼南望三峰浩然生思追想昔年之事因成篇题旧寺》诗。“再忝科第”指本年联登进士、宏辞两科。（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云：“公曰：‘卢华州，予之堂舅氏也。’”）

按，“再忝科第”，仅指贞元十一年冬登宏辞科一事。据郁贤皓《唐刺史考·京畿道·华州》知，刘禹锡舅氏名卢微，乃贞元十年三月至十六年（800）二月为华州刺史。诗题云“舅氏牧华州时，余再忝科第”，是说舅氏为华州刺史时，我第二次登科。“再”指第二次，而不是指两次。因贞元九年春刘禹锡进士及第时，舅氏尚未“牧华州”，与题意不符。“余再忝科第，前后由华觐谒”，“前”当指“再忝科第”前即贞元十年三月至十一年冬前；“后”则指“再忝科第”后即贞元十一年冬后。若贞元九年联登进士、宏辞两科，则“前”应指贞元九年春之前，“后”包括贞元九年春至贞元十年三月前，然而这一时期，舅氏并未“牧华州”，如何“觐谒”？可见贞元九年刘禹锡“联登进士、宏辞两科”是错误的。

《刘禹锡年谱》又于贞元十一年下系云：

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

禹锡《夔州刺史谢上表》云：“贞元年中，三忝科第。”《苏州刺史谢上表》云：“谬以薄伎，三登文科。”按即前年之进士科、宏辞科与本年之吏部取士科（拔萃科）。

按，所谓“三忝科第”、“三登文科”，并不是指贞元九年联登进士科、宏辞科和贞元十一年之吏部取士科即拔萃科，而是指贞元九年之进士科、贞元十一年之吏部取士科即宏辞科和贞元十八年（802）之调补京兆府渭南主簿时所参加的铨选。

刘禹锡为太子校书期间，于贞元十二年（796）遭父丧，守制满后，被杜佑先后聘为徐泗濠和淮南幕府之掌书记一年多。到贞元十七年（801）冬，便辞去掌书记一职，应选格赴京去参加吏部的冬集铨选。铨选时要参加吏部的铨试，铨试多在第二年初即贞元十八年初举行。铨试项目为身言书判。判是

<sup>①</sup> 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第七章，第261页。



铨试的重点,对有文采的选人,有时也试以诗赋杂文。如《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云:“侍郎出问目,试判两道。……或有试杂文,以收其俊义。”为了注拟官职时公平合理有依据,于是书判等第就很有必要,考判入等往往成为注好官注京畿官注清要官的依据之一。《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就说:“凡试判、登科谓之‘入等’,甚拙者谓之‘蓝缕’。”所谓“蓝缕”就是考判极差,不合格,这类人一般是不注官的。而考判入等者往往被注以好官。刘禹锡就是“试判入等”的,故被注以畿县官,“调补京兆渭南主簿”。同时登科的还有韩泰。刘禹锡于大和元年(827)写有《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余同迁见赠》诗,云:“舍矢同瞻鹄,当筵共赛梟。”并在此二句下注曰:“吴兴与余同年判入等第。”<sup>①</sup>杨八庶子指杨归厚,时为太子左庶子;韩吴兴即韩泰。是年秋,刘禹锡被任命为主客郎中,分司东都;韩泰被任命为湖州刺史。湖州,天宝年间称之为吴兴郡,故名。所谓“同迁”即指此。诗注“吴兴与余同年判入等第”,当指贞元十八年韩泰与刘禹锡铨选时皆考判入等事。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补遗》载:“刘禹锡云,与柳八韩七诣施士丐听《毛诗》。”柳八为柳宗元,韩七为韩泰。又据韩愈《施先生墓铭》载:“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学博士施先生士丐卒。”<sup>②</sup>由是知贞元十七年冬至十八年春,柳宗元、韩泰、刘禹锡俱在长安,三人同听施士丐讲《诗经》当在此时。韩、刘考判入等也就在贞元十八年春。《刘禹锡年谱》以为“吴兴与余同年判入等第”,是指贞元十一年刘禹锡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韩泰登进士第,中吏部取士科”。韩泰于贞元十一年春进士及第不假,但并未“中吏部取士科”,也就是说并未与刘禹锡于是年冬同登宏辞科,因宏辞科并不考判,与刘诗注“同年判入等第”不符。故知贞元十一年韩泰不可能中吏部取士科。

### 三 柳宗元登科入仕考

柳宗元,两《唐书》有传。《旧唐书》云:“登进士第,应举宏辞,授校书郎。”《新唐书》云:“第进士、博学宏辞科,授校书郎。”二书均未言其及第、登科之年月。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却云:“贞元九年,宗元得进士第。”<sup>③</sup>《唐才子传》卷五亦云:“宗元字子厚,河东人,贞元九年苑论榜第进士,又试博学宏辞,授校书郎。”知柳宗元于贞元九年进士及第。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一三和今人施子愉先生《柳宗元年谱》俱将柳宗元进士及第系于贞元九年下<sup>④</sup>,当是正确的。

但《登科记考》卷一四将柳宗元登博学宏辞科系于贞元十二年下,而《柳宗元年谱》却系于贞元十四年(798)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到底哪一种系年是正确的呢?

《登科记考》和《柳宗元年谱》在登科系年中都引用了柳宗元《与杨诲之疏解车义第二书》中的一段话,现逐录如下:

吾年十七求进士,四年乃得举。二十四求博学宏词科,二年乃得仕。<sup>⑤</sup>

据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载:“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sup>⑥</sup>则其生年当为代宗大历八年(773),十七岁则为德宗贞元五年。这就是说,柳宗元于贞元五年十七岁时就被州府举荐去应进士试,四年后即贞元九年二十一岁时始进士及第。

“二十四求博学宏词科,二年乃得仕”,歧义较多。《登科记考》认为柳宗元于贞元十二年二十四岁时登博学宏词科。理由是《文苑英华》收录有是年博学宏词科试题《披沙拣金赋》,撰此赋者有四人,

① 《全唐诗》卷三六三,第4097页。

② 《全唐文》卷五六六,第5731页。

③ 《全唐文》第五八八卷,第5942页。

④ 施子愉《柳宗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页。

⑤ 《全唐文》卷五七五,第5810页。

⑥ 《全唐文》卷五六三,第5697页。

其中就有柳宗元。《柳宗元年谱》却认为贞元十二年柳宗元“应博学宏词科，未第”。贞元十四年，“二十六岁。第博学宏词科，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唐才子传校笺》对以上二书采取了折衷的态度，认为“宗元于贞元十二年登博学宏词科后，未即入仕。两年后，即至贞元十四年，始为集贤殿正字”<sup>①</sup>。《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二卷有吴文治先生的《柳宗元》评传，则认为“贞元十二年，柳宗元二十四岁，被吏部分发担任秘书省的校书郎”，“过了两年，朝廷举行博学宏词科考试。……柳宗元在这次考试中榜上有名，立刻被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sup>②</sup>。

贞元九年，柳宗元进士及第。按唐制，守选三年，也可第二年就参加科目选考试，但他却要等到贞元十二年始参加博学宏词科试，这与他丁忧守制有关。贞元九年五月，他父亲病逝，他必须守丧三年，实际上是二十七个月。在这期间，他不能参加任何考试。

一般来说，吏部的科目选多在每年的春天举行考试，但贞元十二年的科目选试却并未在这年春天举行。如前所述是在贞元十一年的十二月举行的。

既然贞元十二年这一届的博学宏词科试是在贞元十一年十二月举行的，那么贞元十二年春当然也就再不会举行考试了。贞元十二年春未举行博学宏词科试，我们还可以从柳宗元本身找到证据，即从他本人的活动中得到印证。贞元十二年正月初九，柳宗元的叔父卒于邠州，时柳宗元一直在邠州叔父家，他又于二月二十八日护丧至长安，葬叔父于万年县少陵原<sup>③</sup>。由此可知，柳宗元没有参加贞元十二年春的博学宏词试，因贞元十二年春并未举行博学宏词科考试。

既然贞元十二年春未举行博学宏词科考试，那么，柳宗元于贞元十二年却参加了博学宏词科试，这又作何解释呢？

原来，贞元十三年（797）这一届的博学宏词科试也是在贞元十二年底举行的，柳宗元参加的就是这一届的博学宏词试。

《登科记考》在贞元十二年博学宏词科下载有是年的试题，为《披沙拣金赋》和《竹箭有筠诗》，并收有这年宏词登科者六人，即李程、柳宗元、李挚、李行敏、席夔和张仲方。对此，我们有必要一一辨析之。

一般来说，吏部科目选试每年举行一次，其中博学宏词科试每届最多取三名，且宁缺勿滥。《登科记考》以为贞元十二年博学宏词登科者六人，当是错误的。

李程，《登科记考》在其名下注曰：

《广卓异记》引《登科记》：“李程，贞元十二年进士，状元及第。十三年宏词头登科。”按，“十三年”为“十二年”之讹。

按，李程于贞元十三年宏词头登科并不误。贞元十二年春并未举行博学宏词科试，即使举行了，李程也不会登科的。所以李程进士及第后只能参加贞元十三年这一届的宏词试，而这一届的宏词试却是在贞元十二年的年底举行的，但录取放榜是在贞元十三年年初。故曰“十三年宏词头登科”为不误。

再看柳宗元。《登科记考》云：

宗元《与杨晦之第二书》云：“吾年二十四，求博学宏词。”韩注：“贞元十二年，公年二十四。”又《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云：“宗元向以应博学宏词之举，会阁下辱临考第，司其升降。”

所谓“求博学宏词”，是指到州府参加宏词试，以便求得宏词解，有了宏词解，才能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试。由此可知，柳宗元于贞元十二年秋二十四岁时参加了京兆府的宏词解考试，解取到后便参加了是年年底的吏部宏词试，但却落选了。这由他所写的《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可知。按，此

①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五“柳宗元”条，第463页。

②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525页。

③ 见《全唐文》卷五九一柳宗元《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第5973页。

启题目有误，博学宏词科为吏部科目选，而非制举科目，云“应制举不敏”者，当系后人传抄时所改。“大理崔大卿”，即“大理卿崔大”，因其排行老大而称之。但这一称呼不妥，因柳宗元与他并不非常熟悉，地位又相差甚远，不可能这样称呼。《柳宗元年谱》引此启为《上大理崔少卿应制举不敏启》，称其为崔少卿，可从。按，大理寺有卿一人，从三品；有少卿二人，从四品上。则“崔大卿”当为“崔少卿”之误。《柳宗元年谱》以为此“崔少卿”乃《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崔同或崔锐，不确。应为何人，不详，待考。此崔少卿当为贞元十二年宏词试考官，柳宗元落第后便向他上书云云，此书之题目应为《上大理崔少卿应宏词不敏启》。

《登科记考》又系有李摯、李行敏二人，并在李行敏名下注曰：

《摯言》：“贞元十二年，李摯以宏词振名，与李行敏同姓，同年同登第，又同甲子，登第时俱二十五岁，又同门。摯尝答行敏诗曰：‘因缘三纪异，契分四般同。’”

其实，李摯、李行敏，与李程、柳宗元并非同一年考试的。李程、柳宗元参加的是贞元十三年这一届的宏词试，考试时间在贞元十二年底。而李摯、李行敏参加的是贞元十二年这一届的宏词试，考试时间在贞元十一年十二月。李摯必为贞元十二年这一届的宏词头，故其振名就应在贞元十二年。除李摯、李行敏外，这一届登科的还有刘禹锡。

与李程同时登科的是席夔与张仲方。《登科记考》在二人名下都注曰：“见《文苑英华》。”按，《文苑英华》所收各类省试题，并非全都是及第者所留下的，有许多是当年应试而落第者所写，也有一些是他人的模拟习作。《文苑英华》收有李程、柳宗元、席夔、张仲方四人的是年宏词赋《披沙拣金赋》就属这种情况，李、席、张三人赋是及第者所写，柳赋是落第者留下的。《登科记考》又收有李、席、张三人的是年宏词诗《竹箭有筠诗》，柳宗元的诗当佚。

总括以上，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这三届的博学宏词科都是在前一年的十二月举行的，即在贞元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二月举行的，登贞元十一年这一届宏词科的是陈讽、王太真、庾承宣三人；登贞元十二年这一届的是李摯、李行敏、刘禹锡三人；登贞元十三年这一届的是李程、席夔、张仲方三人。

贞元十三年这一届的宏词试既然是在贞元十二年底举行的，则贞元十三年春当不会再举行宏词试了。

贞元十四年这一届的宏词试却并没有在贞元十三年十二月举行，而是恢复到贞元十四年春举行的。柳宗元参加了这一届的宏词试，并登科了。所谓“二十四求博学宏词科，二年乃得仕”即指此。这年，柳宗元二十六岁。

柳宗元博学宏词登科后，即授官集贤殿正字，从九品上。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云：“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两《唐书》本传皆谓柳宗元以博学宏词授校书郎当是错误的。《唐才子传校笺》以为“宗元于贞元十二年登博学宏词科后，未即入仕，两年后，即至贞元十四年，始为集贤殿正字”也不确。柳宗元非贞元十二年登博学宏词科，已如上述。又，凡博学宏词登科者，必须立即授官，不可能“未即入仕，两年后”，“始为集贤殿正字”。《新唐书·选举志下》就说：“选未滿而试文三篇，谓之宏辞……中者即授官。”吴文治先生以为“贞元十二年，柳宗元二十四岁，被吏部分发担任秘书省的校书郎”，过了两年，博学宏词登科后，始被调为集贤殿正字，就更是错误的了。按唐制，进士及第，必须守选三年，第四年才能被吏部铨选而授官。柳宗元贞元九年进士及第，守选三年后于贞元十三年春才有资格被吏部铨选授官，而贞元十二年就“被吏部分发担任秘书省的校书郎”不符合唐制，当系猜测之词。实际上，柳宗元从来就没有担任过秘书省校书郎，其误当导源于两《唐书》本传。中书省集贤殿书院正字才是柳宗元的释褐之官。

〔作者简介〕王勋成，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发表过专著《唐代铨选与文学》等。